

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探讨

李贵扬,曹萌萌

(河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0)

摘 要: 刑法学与民法学是看似相互独立、泾渭分明的两种学科,但在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交织在同一案件中的现象却多如牛毛,其中所涉及的案件性质认定、刑民责任划分、程序适用等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着各级司法机关的疑难问题。当前司法实践中主要有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先民后刑三种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模式,三种模式可以说是互有优劣并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本文通过对三种审理模式进行利弊分析,提出了依据刑民交叉案件类型灵活选择审理模式的观点。

关键词: 刑民交叉; 审理模式; 公平与效率; 法秩序统一性

中图分类号: D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132(2018)05-0023-05

一 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认识

(一) 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及类型

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学术界存在诸多观点,虽然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均系以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两个概念为核心进行定义^[1],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同时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并在案件事实、法律关系上存在交叉、牵连、影响的案件。

就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划分,学界现存两种划分标准,一种是以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为标准,另一种是以案件内容差异为标准。

以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为标准的,又具体细分为二类说与三类说。持二类说观点的学者将刑民交叉案件划分为“牵连型的刑民交叉”与“竞合型的刑民交叉”。所谓“牵连型的刑民交叉”,指的是案件中的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刑、民法律关系,与此同时不同法律事实之间又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进而导致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交叉;所谓“竞合型的刑民交叉”,即法律事实完全重合,并因同时涉及刑、民法律关系进而形成的刑民交叉案件。

持三类说的学者们认为,二类说的划分并不足以涵盖所有类型的刑民交叉案件,故又增加“疑难复杂型的刑民交叉”这一分类,即由于司法实践的复杂性,同一事实引发的法律关系,在性质上存有争议,其本质上涉及的是该法律事实应由何种法律规

范调整的问题^[2]。

以案件内容差异作为划分标准的,亦存在三种分类。第一类是案件所涉行为仅触及民事法律关系,不涉及刑事法律关系;第二类是法律事实所涉及之法律关系实属纵向包容重合关系,即行为对法益的侵害已达到需要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评价的程度^[3];第三类是法律事实所涉及之法律关系是横向的同位并列关系^[4]。

(二) 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取舍

类比分析前文各种划分标准,笔者认为,基于案涉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将刑民交叉案件划分为竞合型刑民交叉案件和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更能契合当下司法实践的需求。理由如下:

基于案件内容差异对刑民交叉案件进行的三种划分,存在诸多值得斟酌和探讨的地方。例如,案件所涉行为之性质未超出民事法律规范调整范围的案件,其实质上并不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即不符合我们对刑民交叉案件所下的定义;对于纵向包容重合关系,实质上就是基于法律事实之间关系划分的竞合型刑民交叉;而对于横向同位关系,实属牵连型刑民交叉。因此,依据案件内容差异进行的类型划分,实质上并不足以单独构成一种分类标准。

对于以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细分的二类说与三类说,笔者认为二类说相对来说更加合理,原因是三类说中所谓的“疑难复杂型的刑民交叉”,即法律关系之性质存在争议的案件,其本质上涉及的是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界定问题,而非

交叉问题。如“勒索华硕案”中大学生黄静因其购买的华硕电脑 CPU 存在问题而向华硕公司索赔 500 万美元的行为究竟属于民法上的消费者维权行为还是刑法上的敲诈勒索行为。虽然如今看来黄静的行为属消费者正当维权行为毫无争议,但是当年黄静却曾被海淀检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批捕。

根据上述论述,我们认为应将刑民交叉案件划分为竞合型刑民交叉案件与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两种类型。

竞合型刑民交叉案件,即刑、民案件事实同一,并因同一事实同时触及刑、民法律关系导致的竞合。竞合型刑民交叉案件中诉讼主体、案件事实、侵害对象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如 A 将 B 打成重伤引发的故意伤害罪与民事侵权行为的竞合案件,诉讼主体均是 A 和 B,案件事实为 A 殴打 B 致 B 重伤,侵害对象均为 B。

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即案件中的不同事实分别满足民、刑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且两种法律关系又因法律事实间的部分重合产生牵连,进而导致案件在法律的适用上出现牵连。该类型的案件中,不同事实之间仅存在部分交叉关系,如存在完全交叉关系,即为竞合型刑民交叉案件。根据主体、内容、对象等要素的不同其又可分为主体牵连、内容牵连、对象牵连。主体牵连是指行为人既实施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又参与了某种民事行为。在民事诉讼中,行为人应就其违约或者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事实进行民事赔偿。在刑事诉讼中,行为人应遭受刑法上的否定性评价,承担刑事责任;对象牵连是指某一标的是犯罪行为和民事行为共同指向的对象;内容牵连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既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又是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

二 刑民交叉案件现行审理模式及利弊分析

目前我国司法实务中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主要采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刑民并行三种审理模式。

(一) 先刑后民审理模式

(1) 先刑后民审理模式的概念及法理基础

先刑后民,即先刑事后民事,亦可称之为“刑事优先”,是指在某一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当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出现交叉、竞合的情形时,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在位阶上和位序上优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

位阶上的优先性即效力优先性,指刑事诉讼认定的事实效力更高,即刑事诉讼认定的事实可以直接作为民事审判的依据在裁判文书中援引,但民事诉讼认定的事实不能在刑事诉讼中直接援引。依据在于证据效力方面,基于刑事侦查手段更加强大、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更高的考虑,刑事诉讼认定的证据在效力上高于民事诉讼认定的证据^[5]。

位序上的优先性主要是指某一案件同时涉及刑、民两种法律关系时,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优先进行。依据在于刑法是公法,其关涉的更多为公共利益,故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民法为私法,其保护的更多为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社会公共利益,故在诉讼程序上民事诉讼要让位于刑事诉讼。

先刑后民的出现是国家本位思想的集中体现。刑法是公法,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而民法是私法,代表和维护的是公民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相比个人利益具有优先性,由此刑事诉讼在价值层面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另一方面,从程序法角度去考量,刑事诉讼所独有的多部门参与性、强大的侦查取证能力、较高的证明标准等特征,使刑事诉讼相较民事诉讼更能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以便更好地审理即将进行的民事诉讼^[6]。

(2) 先刑后民审理模式的合理性及缺陷

先刑后民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利于提高民事审判效率、促进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刑事诉讼无论是在证据搜集能力上还是在证据规则、证明标准上都明显高于民事诉讼,使得刑事案件中认定的事实更加接近于案件的客观事实,可直接在民事诉讼中援引作为裁判的依据;第二,有利于及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第三,有利于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避免刑、民诉讼程序对同一事实做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先刑后民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该模式有悖于当代“权利本位”的基本法治理念。先刑后民要求当个人权利与公权力发生冲突时,个人私权要让位于公权,其背后反映的公权优先的价值理念,极易导致对私权利救济的漠视;第二,该模式有违刑法谦抑的基本理念。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适用刑法对社会进行调控应当具有适度性和最后性。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只有当某一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用其他法律规范已无法制裁或无法实现预期效果的情形下,才应适用刑法进行评价。因此当刑法介入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时,必须谨慎考虑其

适用的必要性,而先刑后民的处理模式恰恰颠倒了这一顺序;第三,侵害了被害人(民事原告)的程序选择权,给其维权制造了障碍。如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迟迟不能归案,因我国刑事诉讼并无缺席审判的相关制度,刑事诉讼久拖不决,被害人(民事原告)的民事赔偿也将难以到位;第四,该模式可能导致被告人滥用诉讼程序,逃避民事赔偿责任。如果一味倡导先刑后民的处理模式,那么极有可能存在部分当事人故意制造存在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纠纷的审理,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第五,一定程度上为地方保护主义打开了便利之门,为公权力干预经济纠纷提供了空间^[7]。

(二) 先民后刑审理模式

(1) 先民后刑审理模式的概念及法理基础

先民后刑处理模式是指在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诉讼优先进行,该种模式针对于民事部分的审理不受刑事责任认定影响,且刑事部分的审理依托于民事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先予确定之案件。如涉及知识产权犯罪的案件,罪与非罪的认定必须依赖于民事诉讼对知识产权归属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判断。

先民后刑的法理基础在于:第一,如前所述,刑事案件审理的现实需求;第二,体现了国家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充分尊重与保障,是“权利本位”基本理念的集中体现;第三,刑法谦抑的基本要求。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只有当某一行为超出其他部门法的调控范围或者通过其他部门法进行调控难以产生预定的社会效果时,才应由刑法进行调控^[8]。

(2) 先民后刑审理模式的合理性及缺陷

随着“权利本位”观念的深入人心,个体权利的保护问题在社会上引发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先民后刑的处理模式应运而生。

该模式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利于提高被告人民事赔偿的积极性。由于民事赔偿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定罪量刑产生直接影响,因而民事诉讼优先进行可以极大地提高被告人赔偿的积极性;第二,有利于及时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通过刑罚手段剥夺被告人的自由乃至生命,确实能使被害人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但对大多数被害人或者其家庭来说,经济上的需求往往更加迫切。因此,民事赔偿的及时到位,更有利于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第三,对法院而言,提高诉讼效率,缓解刑事案件民事赔偿执行难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先民后刑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引发了“花钱买刑”的司法争议,诱发权钱交易。先民后刑最大的弊端在于

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在客观违法行为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仅因行为主体的赔偿能力的不同,导致某些被告人因不具备赔偿能力而锒铛入狱,而具备赔偿能力的被告人却可以以达成刑事和解为由,判处较轻的刑罚、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甚至可能不构成犯罪,从而引发了“花钱买刑”的说法。同时,刑事和解制度给予了司法工作人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诱发权钱交易,导致司法腐败;第二,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在事实认定上产生冲突。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上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民事诉讼奉行“优势证据规则”,法官在事实认定方面仅需达到“高度盖然性”的内心确信即可,因此,二者在事实认定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同时民事诉讼缺席判决制度的存在使得民事诉讼认定的事实可能更加偏离案件的“客观真实”;第三,可能造成对法秩序统一性的冲击。基于“违法一元论”的违法性判断立场,对某一行为的评价应在全体法秩序统一评价的基础上进行违法性判断,但先民后刑的处理模式有可能导致对于同一事实,不同的部门法之间在违法性判断上产生不同的立场,容易引发人们的行为混乱。比如轰动一时的“帅英骗保案”,在保险合同成立且已生效的情况下,帅英的行为能否构成保险诈骗罪,在理论界与实务界曾引发巨大争议^[9]。

(三) 刑民并行审理模式

(1) 刑民并行审理模式的概念及法理基础

“刑民并行”又称“刑民分离”,即当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发生牵连、交叉时,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审判程序并列进行,两者在时间上无先后顺序,在效力上不存在依附关系,在位阶上无大小之分。

刑民并行审理模式的法理基础在于:第一,公权与私权兼顾。司法实务中先刑后民、先民后刑两种处理模式的选择实质上就代表了两种权利(力)间的博弈,然而二者的出发点却是一致的,即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因此找到二者的平衡点才是最合理的选择,刑民并行的处理模式即是此种理念的产物;第二,公平与效率并重。司法实务中,如何在实现公平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效率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这句法谚似乎是对二者最好的诠释。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选择的最终目的是公平、高效地解决刑民纠纷,即在实现社会正义(打击刑事犯罪)的基础上尽可能提高效率(对受害人及时进行民事救济),相比其他处理模式,刑民并行处理模式是更好的选择;第三,实现各种利益间的平衡。刑民交叉案件具体涉及国家、犯罪行为、受害人三者间的利益。诉讼的本质在于对各方利益进行

重新分配,以实现公平正义。刑民并行的处理模式,有利于更好地分配各方利益,最终达到利益间的平衡。

(2) 刑民并行审理模式的合理性及缺陷

刑民并行审理模式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体现了国家对公权力与私权利同等保护的价值取向;第二,赋予了被害人(民事原告)选择救济渠道的自由,其不仅可以选择提起民事诉讼来对自己所遭受的损失进行救济,也可以通过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方式来主张权利,还可以通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附带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方式来挽回自己的损失,被害人(民事原告)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对其最有利的选择;第三,充分保障了被害人(民事原告)的诉讼权利。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诉讼规则方面及赔偿范围方面有较大差异,甚至可能直接影响到案件的裁判结果。首先在诉讼规则方面,民事诉讼认可自认规则,对一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人民法院可直接在裁判文书予以认定并作为裁判依据;在无法找到被告人或者被告人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时,民事诉讼允许缺席判决,原告的请求仍有可能得到支持。然而刑事诉讼中却并无类似规则,刑事诉讼中,要求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环环相扣,形成证据链条,故不能仅凭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而认定其有罪,在被告人未到案之前,审判程序无法进行,这种情况下,只能允许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才能维护其权益;其次在赔偿范围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直接物质损失,而民事诉讼则支持间接损失及精神损害赔偿。

任何制度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做到百利而无一害。刑民并行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浪费了司法资源。如竞合型刑民交叉案件中,同一事实,却要由两个不同的审判部门分别进行审理。且由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诉讼规则、证明标准上的差异,极易导致刑民判决在事实认定上的冲突,为解决这种冲突,必然要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正,势必会造成司法资源的第二次浪费;第二,不利于刑事和解的进行^[10]。被告人选择刑事和解的动力在于争取诉讼中的宽大处理,如在一个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甚至判处缓刑等,为此其会积极对受害人进行补偿,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使受害人得到较多的民事赔偿。而在刑民审判程序并列进行时,有可能出现刑事案件先于民事案件审结的情形,被告人发现无法通过刑事和解程序获得宽大处理,其就丧失了积极赔偿的动力,甚至于出现隐匿、转移财产等逃避民事赔偿的行为,致使民事赔偿难以执

行到位,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无法弥补。

纵观上述三种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可以说是各有利弊,每一种审理模式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及相应的适用范围。当下学者们对先刑后民的审理模式多持批判态度,对先民后刑或刑民并行的审理模式则愈发推崇。笔者认为,片面讨论上述三种审理模式孰优孰劣并无实际意义,即便已经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种种弊端的先刑后民,亦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存在,若将其全盘予以否定,将不利于部分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只有将上述三种模式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刑民交叉案件类型、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依赖关系、公平与效率等多重因素,才能选择恰当的处理模式。

三 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的适当选择

(一) 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

以刑民并行审理模式为原则。对于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笔者认为应当以适用刑民并行审理模式为原则,以适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审理模式为例外。原因在于,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中,引起刑民法律关系的并非同一事实,不同事实之间仅仅是存在牵连关系,此时,查明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中的事实并不存在先后顺序之分。此外,由于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不同,相应的在事实认定、责任划分方面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也存在差别,刑民并行有利于提高案件审理效率。因此,对于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宜以刑民并行处理模式为原则,如此不但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更可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但是,一旦刑(民)法律事实必须以另一事实的认定为前提的情况下,则应适用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的审理模式。适用先刑后民审理模式的情形有:犯罪行为影响民事行为效力认定、权利确认之情形,如民事诉讼中的善意取得制度,买受人能否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物的所有权,应以物不属于赃物为前提,故应由刑事诉讼先行对事实进行认定;继承权纠纷案件中继承人行为涉嫌犯罪之情形,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继承人丧失继承权。适用先民后刑审理模式的情形主要有:知识产权犯罪中案涉知识产权权属争议的,财产性犯罪涉及财产确权纠纷的,应先由民事诉讼对产权归属问题进行确认。

(二) 竞合型刑民交叉案件

以先刑后民审理模式为原则。对于竞合型刑民

交叉案件,笔者认为应以先刑后民审理模式为原则,以刑民并行、先民后刑审理模式为例外。原因在于,竞合型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均是基于同一事实所产生,而案件事实的查明,对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认定均具有重大意义。因刑事侦查机关办案经验丰富、侦查手段多样,且刑事诉论证标准高于民事诉讼,故刑事诉认定的事实更接近于案件的客观真实,更有利于案件实体正义的实现,且能够避免刑民判决在事实认定上的冲突,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和法秩序的统一性。另外,刑事诉讼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决部分民事赔偿问题,例如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机关所采取的追赃、退赔等措施,从某种程度上亦是对受害人物质损失的弥补,节约了司法资源,并且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

参考文献

- [1] 张明楷. 实体上的刑民关系[J]. 人民法院报, 2006(5): B01.
[2] 张明楷. 程序上的刑民关系[J]. 人民法院报, 2006

- (5): B01.
[3] 江伟, 范跃如. 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J]. 法商研究, 2005(4): 31-36.
[4] 杨兴培. 刑民交叉案件法理分析的逻辑进路[J]. 中国刑事法学杂志, 2012(9): 18-24.
[5] 陈兴良. 关于“先刑后民”司法原则的反思[J]. 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2): 16-19.
[6] 游伟. 刑民关系与我国的刑事法实践[J]. 华东刑事司法评论, 2006(8): 190-224.
[7] 陈瑞华.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三种模式[J]. 法学研究, 2009(1): 92-109.
[8] 薛进展, 刘琪, 王志坚. 刑事优先原则适用与限制的具体途径[J]. 法学, 2006(2): 146-150.
[9] 王林清, 刘高. 民刑交叉中合同效力的认定及诉讼程序的构建——以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J]. 法学家, 2015(2): 75-91.
[10] 陈兴良. 合同诈骗罪的特殊类型之“两头骗”: 定性 with 处理[J]. 政治与法律, 2016(4): 39-51.

(责任编辑: 徐大超)

DISCUSSION ON THE MODE OF DEALING WITH THE CROSS CASES OF THE CRIMINAL AND THE CIVIL

LI Gui-yang, CAO Meng-meng

(Law School,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0, China)

Abstract: Punishment law into and seemingly are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the two distinct disciplines, but in the complicated judicial practice, criminal law and civil legal relations interweave in the same phenomena are a dime a dozen, in the case of the cases involved nature determination, punishment and responsibility division, application also has been plagued by problems such as the problems of judicial organs at all levels. The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 mainly include punishment queen people, tortured people first in parallel, the ancients punishment three people after cross processing pattern of case, three models can be said to b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ith each other and have their specific scop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hree modes of treat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view that the mode of treatment should be chosen flexibly according to the types of cross-cases.

Key words: the cross of criminal and civil, trial mod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the unity of law order